

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

许浩然

摘要：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越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齐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关键词：宋代词垣；文学空间；制度矩范；个体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23) 05-0179-11

词垣是唐宋以来词臣官署的总称，负责撰写朝廷的诏书制诰。宋代词垣包括学士院与舍人院（元丰改制后为中书后省）两处文书机构，前者为内制词臣如翰林学士、直学士院的官署，后者为外制词臣如知制诰、中书舍人的官署。关于宋代词垣的研究，文史学界已然积累有较为丰富的成果，颇有论著就词垣人员建制、制度运行、人事风尚、撰述文献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具体的探讨。^①然而，将词垣视为一种文学空间，进而予以整体性地观照、机制性地探析此中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感的著述，目前似还较为缺乏。宋代士大夫阶层在朝野之间进行诗文活动的文学空间种类繁多。词垣作为其中的一种，其文学生态有其特殊之处：一方面，与皇朝官僚系统中事务性的衙署有所不同，撰述文辞本身即词垣代言的职事，因此，词垣主流的文学活动时时被笼罩在制度矩范的氛围之中——其应制文本的撰述自是须凸显皇权中立的立场与宫廷典雅的审美旨趣，而署中其他应景诗文的写作亦多受此影响，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词臣侍从宫禁的清贵生活与雅致情趣。这些撰作篇什以文学研究看重抒写情志性灵的本位立场来看，价值确实不高。然而另一方面，词垣中的每一名臣僚作为承载士大夫文化的精神个体，人生阅历又绝不仅局限于词垣。他们的词垣生涯短则数月，长则十数年，仅是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段落。担任词臣期间，这些臣僚时而在自觉不自觉间将漫长人生历练中蕴积的个体情怀渗入词垣的职事与生活，于某些撰述吟咏之中实现对制度语境的超越。此一迹象以文学研究的本位立场来看，又颇值得重视。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希望建构一种论述机制，通过制度规范与个体情怀两种语境来整体观照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具体而言，本文拟从宋代词垣生活中选择四个代表性的面相，探究上述两种语

作者简介：许浩然，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西安 71004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词臣文化与文学研究”（17CZW019）

① 相关研究如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施懿超：《宋四六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宋靖：《唐宋中书舍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杨芹：《宋代制诰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陈元锋：《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等。

境在这四个面相中的表现形态:其一,观照词臣的当行本职应制之务,择要论述宋代文才超卓之士担任词臣、执掌制诰的事迹。这类才士的草制行为尤能反映制度与个性的互涉态势,他们一面受到制度的笼罩,制词撰述的政治意向丝毫不能逾矩,另一面又好尚展露个体情怀,挥洒文翰之际所显露的气概魄力往往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其二,观照词垣相对闲暇的值宿生活,择取宋诗史上不同时段三个诗歌流派——“西昆”派、诗文革新群体与江湖派,以这三派中曾有词臣仕历的人物的值宿诗作为对象,探析他们基于各自生平经历而形成的诗风差异,寻绎此中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的消长之势。其三,考察词臣与其俯视、差遣的吏员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吏员在词垣供职的时间普遍长于词臣,常常更能洞悉制度实际运行中的世态人心,他们对词臣应制中的某些骋才之举与文胜之迹提出指摘意见,颇能折射制度对词臣个人才情的制约。但同时某些扬显词臣个体情感、才华的诗文中,吏员的角色往往又作为一种修辞性的符号元素托举了词臣个人化的形象。其四,考察宋代词臣尊仰、追慕前朝词垣贤臣的文化现象,其中白居易生平仕进、退闲二者兼容的心态对宋代词臣群体尤具典范意义。宋代词臣在制度矩范中称述白氏的代言之功,按照皇权意志将其形象框定在龟勉仕位的工具意义之内;而在慰抚个人宦场失意的情怀之时,则将白氏的闲适风度作为一己的精神寄托。以上四个方面涉及宋代词臣侪辈生活的“作”“息”“俯”“仰”,它们既各成畛域,又两两相对,颇能辐照词垣撰述职事、吟咏生活的荦荦大端,呈现词垣文学空间内制度与个性之间特有的张力。^①

一、应制之务与超卓之士:以苏轼为例

草拟制诰文书及其他的应制文字是词臣的当行本职。目前学界对宋代词垣的应制之务已有较为充分的探讨:在制度方面,已然总结出宋廷各类应制文本体式、行文规范,这些规范要求词臣以雅正的制词彰显朝廷的体面、威严以及治政的合理性;在个体意向方面,也已指出,词臣个人在草制过程中亦会基于自身的主观立场来具体把握制词的轻重语气及扬抑态度。^②可以说,词垣的应制之务交织展现出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两种语境。

有宋一代,颇有文才超卓之士进入词垣任职,这类人物的卓越才华与词臣的清贵位望相辅相成,受瞩目当时。然而,在他们的人生格局中,词臣与才士这两重身份又存在彼此对峙的张力:词臣职事隶属官僚系统,其所撰述时刻受到上层权力的支配牵引;才士则作为诗文领域的卓异文士,于挥洒文翰之际会在自觉不自觉地间显露个人的才性与情怀。这类人物撰作应制之文,于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两种情境下,颇能展现其人作为词臣与作为才士的差异性,在此我们可举元祐年间苏轼草制之事作一探讨。

元祐年间,苏轼进入词垣,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的词臣之职。首先来看苏轼草制之务中制度矩范的一面。元祐二年(1087)朝政的实际统治者高太后领受尊号册命,苏轼以翰林学士草拟受册制文,出现过一次制词不当上意的事件。《石林燕语》载:

明肃太后(即仁宗嫡母刘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王沂公(即王曾)争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即高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德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德为非是。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指刘太后)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闻者无不畏服。是岁,册礼止御崇政殿。^③

① 近年宋史研究领域倡导“走向‘活’的制度史”,指出制度在明文规定之外,其实际运行的过程更存在人为主观干预的环境因素,如“关系网络、利益纠葛、不同角度的人对制度的理解以及他们所持的态度甚至谋虑”等,这些都应作为考量的内容(参见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编:《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第128页),提示出客观制度与主观人情之间存在的张力。本文以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两种语境建构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颇有得于这一理念,并希求将之从史学研究的领域引入文学研究的领域。

② 杨芹:《宋代制诰文书研究》,第48-66、181-190页。

③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页。

仁宗朝刘太后领受尊号册命，以礼仪规格较高的外廷宫殿文德殿作为受册地点。高太后为示谦逊，不随刘氏故事，改以规格较低的内廷宫殿崇政殿为受册之地。苏轼草制，对比两朝规制，以一种微议的口吻评述刘氏旧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制词原文云：“矧予凉薄，常慕谦冲，岂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爱君之深。所有将来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其中“常慕谦冲”“无过之地”二语含蓄表达了对刘氏的指摘。高太后认为此意彰显刘氏之失，有损朝廷尊严，命谕改以他词：“仰惟章献明肃皇后，辅佐真庙，拥佑仁皇，茂业丰功，宜见隆异。顾予凉薄，绝企徽音，稽用旧仪，实有惭德。所有将来受册，可止于崇政殿。”修改后的制文自称己德不如刘氏，故才降用礼格，意在维护刘氏，进而维护朝廷的体面。苏轼遵循词垣故事，以制词改易之事自请罢职，高太后下诏不允。^①这一事例鲜明地显示出朝廷规制对苏轼词臣身份的笼罩。苏轼在制词中微议刘氏，寄寓了其个人对前朝政事的道德立场，但其批评皇室人物的论调与词臣应制的代言角色、朝廷治政的“政治正确”格格不入，故为高太后驳回，苏轼本人亦须在公事程序中表现引咎自辞的姿态。

其次来看苏轼草制之务中个体情怀的一面。元祐三年宋廷“以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②这是当时朝廷一件任命宰执的政治事务，高太后事先与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商议决策，^③对此三人皆有重用。其时苏轼亦参与此事，不过他并不能参加决策，而是作为翰林学士负责草拟三人的任命诏书。相对于以上位居权力核心的宰执之臣而言，苏轼属于周边人物的角色，只能在工具性的意义上履行词臣的草制之务。然而，我们如果考察苏轼本人关于此次草制之务的叙述及其所撰的制诰文字，就能于其公事程序之外发现一层别样的文学情韵。与苏轼同时而稍晚的王巩在其笔记《随手杂录》中记载了苏轼的这一草制之任：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

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子瞻亲语余。^④

王巩称此段内容出自苏轼的“亲语”，自可视为这是对苏轼本人自叙之言的转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这段内容有所征引，但对草制前苏轼醉酒之事未予采录。^⑤显然，醉酒属于较为私人化的叙述，并不适宜纳入正统的政治史著。然而，正因为这种私人化叙述的独特性质，益发能够引起当今研究者探求古人心态的兴趣。我们如果仔细体味苏轼特意叙及此一情节的用意，或许就会联想到唐代李白待制翰林时期的一则事迹：“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⑥两相比照之下，苏轼醉酒草制与李白醉酒撰辞的情节可谓如出一辙。如此，则苏轼自叙醉酒，当是存有自比李白的用意，或为其自矜文思敏捷之心态的一种表现。

苏轼在此草制职事中撰有《除吕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上柱国食邑实封余如故制》，中有两句云“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⑦《苕溪渔隐丛话》引《东皋杂录》对此有一段相关记载：

东坡善嘲谑，以吕微仲（即吕大防）丰硕，每戏曰：“公真有大臣体，《坤》六二所谓直方大也。”后拜相，东坡当制，有云：“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动。”……微仲不悦。^⑧

《易·坤》六二爻辞有“直方大”之语，^⑨苏轼在制词中用此语典戏谑升任左仆射的吕大防身材的肥

①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646-9647页。

② 《宋史》卷一七《哲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6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九据吕大防家所藏敕札及奏稿文献，记载了此番任命之前高太后与吕大防的商议之语（第9964-9965页）。揆诸情理，高太后当时亦必与吕公著、范纯仁有所商议，只是相关文献现已不存。

④ 王巩：《随手杂录》，戴建国、陈雷整理，《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6册，第57-5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九，第9965页。

⑥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曹中孚点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

⑦ 《苏轼文集》卷三八，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5页。

⑧ 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六，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1页。

⑨ 《周易正义》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

硕,在庄严的制造文本中寓以诙谐的嘲哂之语,这一特立之举颇令吕大防感到尴尬不快。其实,如此举动在苏轼的元祐仕历中并非个例,考察此期苏轼事迹,有一个现象令人印象深刻,即苏轼立于朝臣之列,特喜为戏谑嘲哂之语,相当明显地表现出矜才压众的气魄。如他以“司马牛”之号戏谑左仆射司马光为政执拗,^①以“顾屠”之号戏谑翰林学士顾临体貌肥壮,以“奉大福以来绥”之句戏谑翰林学士许将旧时程文,以“九子母丈夫”之号戏谑知开封府事钱勰家有九子,^②以“捣残姜桂有余辛”之句戏谑中书舍人曾肇诗韵连绵,^③以“避夫子塔”之喻戏谑中书舍人刘攽所得风疾,^④以“糗糒鄙俚叔孙通”之号戏谑崇政殿说书程颐固守礼法,^⑤等等。对此蔡絛《铁围山丛谈》有云“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指起绰号)殆遍也”。^⑥苏轼曾撰《李太白碑阴记》,对李白立朝“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的风范颇为神往。^⑦由上述事例来看,他的元祐行止即相当充分地展示了这一风范,而嗤哂吕大防之事尤能显示其戏谑举动已由私下言行延伸到了应制公务之中。就此事件的文学情韵而言,苏轼是彰显文采、标举特立的中心人物,他的个人情怀超越了工具性质,彰显出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而位高职重的宰执之臣则俨然成为他挥洒文翰的陪衬。颇堪玩味的是,皇权在此事中对苏轼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未诟病这篇制词的出格之处。这或许一则因为此中谑语与政治意向无涉,只是无甚深意的玩笑之辞;一则因为吕氏虽然仕至宰相,但仍属士大夫阶层,嗤哂其人并无伤皇权本身的尊严。以此事件与前述草拟受册文书之事相参,我们或可揣摩出一道皇权意志宽容超卓才士特立之举的心理界限。

二、值宿吟咏与宋诗流派:以杨亿、欧阳修、刘克庄为例

古代官僚机构普遍存在宿夜值班制度,此点之于词垣亦然。词臣值宿词垣,以备随时应承朝廷的草制之命及皇帝的垂询之务。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值宿的大多数时间里,词臣群体其实并无具体的职事,故多有闲暇从容品味光景流转,以至发于吟咏之什。

宋诗史上,颇有不同时代不同诗歌流派的人物进入词垣、担任词臣。这些诗人基于各自特有的生平经历而诗风取向互有差异,投射于词垣值宿吟咏之什的写作上亦不例外。如以探究不同社会阶层相异审美风貌的视角来审视宋诗史上的各个流派,“西昆”派、诗文革新群体与江湖派颇值得注意:“西昆”人物长期任职朝廷的馆阁词垣,多以辞藻缛丽、典实繁复之诗彰显宫廷式的审美趣味;诗文革新群体在中央、地方任职的经历皆很丰富,更能以一种平易的风格表现广阔的士人社会的审美风尚;江湖派诗人的身份则较为边缘,多为长期在基层生活的江湖谒客、里居士人或低级官员,诗风趋尚浅白野俗。这三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杨亿、欧阳修、刘克庄皆有过任职词垣的经历,三者的词垣值宿诗什的风格差异颇能见出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两种语境的消长之势。

首先来看杨亿。作为“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少时即以神童之才授秘书省正字,以后人生的大多数时光在馆阁词垣中度过。他的词臣生涯是自咸平四年至景德三年(1001—1006)任知制诰,自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06—1013)及天禧四年(1020)任翰林学士。^⑧检视杨亿存世诗什,颇能发现相当数量的词垣值宿诗作,依次为《省中当直即事书怀兼简阁长李舍人》《中伏日省中当

①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60页。

② 苏轼戏谑顾临、许将、钱勰之事,参见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朱杰人整理,《全宋笔记》第四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册,第160页。

③ 蔡絛:《西清诗话》卷下,刘德重、张培生点校,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2515页。

④ 何蘧:《春渚纪闻》卷六“苏刘互谑”条,张明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⑤ 孙升述、刘延世录:《孙公谈圃》卷上,赵维国整理:《全宋笔记》第二编,第1册,第143页。

⑥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第59页。

⑦ 《苏轼文集》卷一一,第348页。

⑧ 参见李一飞:《杨亿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149、185、211页。

直》《省中当值书怀呈诸同舍》《直夜》《李舍人独舍》《直夜二首》《禁直》。^① 这些诗作的体裁皆为律诗，其写宫殿楼宇，有“阿阁凌空瓦起烟”“缭垣峣阙庆云深”“阁凤巢高拂彩霓”“凤楼鸳瓦蟾波湿”“鱼钥建章开万户”之句；写值庐内景，有“沧波满壁浮兰橑，修竹当轩荫绮疏”“画烛熏炉对拥衾”“鑪销香篆霭余芬，宴坐氍毹日易曛”之句；写值宿饮饌，有“何处赐冰和郢酒，谁人割炙动鸾刀”“寒水浮瓜散郁陶”之句；写草制文思，有“彩笔时批尺一诏”“十行汉札如丝出，六幕尧天倚杵低”之句。诗中华美绚丽的宫廷意象与密集繁复的语词典故互为映衬，处处炫示着词臣的清贵位势与渊深学识，可谓是词垣制度语境诗意化的呈现。与此制度语境相区别，其中有三首尾联道及退归之志：“只恐承明难久恋，长安桂玉苦相煎”；“欹枕便成鱼鸟梦，岂知名路有机心”；“误濯尘缨成底事，岩阿千古有移文”。不可否认，退归意向超越制度笼罩，可视为一种个体情怀的渗入。然而，杨亿对于这种情怀的表述只是以典故的堆砌带出退隐之旨，略无具体深入的描写与叙述。因此与其说是内容的突破，不如说是形式的点缀——“西昆”体诗的写作，其主体部分在铺陈浓重的富丽气氛之后，结尾往往须以一种淡化的模式来平衡。由是可以说，在杨亿的值宿吟咏中，个体情怀的表达只是作为一种程式性的诗歌元素，一直被制度化的诗境所掩抑。

其次来看欧阳修。欧氏为北宋诗文革新的核心人物，平生在中、地方仕历丰富。其个人总体的文学取向是提倡平易之风，与“西昆”人物制度化的绚丽格调判然有别。^② 然而，当他晚年仕至高阶宦位，诗文写作却又不免沾染上“西昆”气象，即如葛立方《韵语阳秋》所论，欧氏翰苑、宰执时期的诗文好言彰显显宦服色等级的“金带”，“未免矜服炫宠”。^③ 两相比照之下，颇可见欧氏文学品位中个体情怀与制度矩范的并峙态势。这在其词垣值宿诗作中亦有呈现。

欧氏自庆历三年至四年（1043—1044）任知制诰，自至和元年至嘉祐五年（1054—1060）任翰林学士。^④ 翻检欧集，在其知制诰时期的诗什中并未发现值宿之作，但在其翰苑时期的诗什中却能发现相当数量涉及值宿内容的作品，依次为《内直晨出便赴奉慈斋宫马上口占》《内直对月寄子华舍人持国廷评》《内直奉寄圣俞博士》《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诗二首》《奉答圣俞宿直见寄之作》《子华学士曝直未遑出馆伴病夫遂当轮宿辄成拙句奉呈》《雪后玉堂夜直》《和武平学士岁晚禁直书怀五言二十韵》。^⑤ 这些诗作的体裁亦皆律诗，其写宫殿楼宇，有“禁署沉沉玉漏传，月华云表溢金盘”“水精宫锁黄金阙”“千门钥入断人声，楼阁沉沉夜气生”“金阙云开沧海日”之句；写值庐内景，有“莲烛烧残愁梦断，蕙炉薰歇觉衣单”“玉堂影乱灯交晃”之句；写值宿饮饌，有“莫惜宫壶酒屡倾”“俄顷列琼琚”之句；写草制文思，有“号令存宽大”之句；此外，更有一句述及词臣服色：“万钉宝带烂腰褱”，其意正同于前述之“金带”。就诗歌意象而言，上述诗句所展现的依旧是宫廷式的绚丽，显示出欧氏后期诗风在高阶宦位的制度语境中沾染“西昆”的迹象。

然而，除去制度语境，上述值宿欧诗还有相当的篇幅给予了个体情怀的表达，体现出有别于“西昆”的平易风格。欧诗中亦言及退归之志，但不同于杨亿以典代言式的简略表述，而是颇为真切地呈现了退归的意愿与心境。如感叹岁月的流逝、自身的衰病：“岁华忽忽双流失，鬓发萧萧一病翁”；“犬马力疲恩未报，坐惊时节已峥嵘”；“自嗟零落凋颜鬓，晚得飞翔接羽翰。今日遽闻催递宿，不容多病养衰残”。而由此生发退居山林江湖之想：“山林未去犹贪宠，樽酒何时共放怀”；“江湖未去年华晚，灯火微凉暑雨初。敢向圣朝辞宠禄，多惭禁御养慵疏”；“名在玉堂归未得，西山画阁兴

① 参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3册，第1345—1346、1355、1408、1410—1412、1416页。

② 南宋陆游曾有《跋〈西昆酬唱集〉》（马亚中、涂小马：《渭南文集校注》卷二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册，第161页）一文，戏称当时一部《西昆酬唱集》的意外毁坏，是“欧、尹诸人亦有灵”所致。颇能见出宋人对“西昆”格调与欧氏文风分野的认识。

③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8—139页。

④ 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3、169、258、349页。

⑤ 以上诗作的搜集与排列，参见刘德清等：《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册，第1166、1222、1274、1389、1399、1427页；第4册，第1574、1578—1579页。

何穷”。但同时他又不甘全然隐退,更有离朝外任、拥麾地方的心愿:“未知论报效,安得遂樵渔。……引绶夸民吏,椎牛会里间。一麾终得请,此计岂踌躇。”如是曲折心意的呈现,足见欧氏值宿诗对于退归之志的抒写,已不再局于程式性的诗歌元素,而俨然成为一种内容上的突破,开始摆脱制度语境的笼罩。此外,欧氏在词垣值宿时,还与当时位居下僚的梅尧臣互有寄赠之作,上述《内直奉寄圣俞博士》《奉答圣俞宿直见寄之作》两诗即为其例。于“予惭批凤诏”的词垣环境中,欧氏颇能念及时任国子监直讲的梅氏“君叹守萤灯”的境遇,并以“无嫌学舍冷,文字比清冰”之句相勉励。二人在“严城隔几层”的空间隔离下终能达成情谊的相通。以上种种,皆可见出欧氏的值宿诗作在自矜缛丽的馆阁趣味之外,还对称地存在着一番更为平易可近的士人社会的生活情致。

再次来看刘克庄。刘氏为南宋江湖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仕途不顺,长期退闲里居,学界关于他较新的研究集中在对其乡绅身份的观照上,指出“后村体”具有鲜明的村居特点。^①在经过长期退居生活之后,刘氏晚年两度进入词垣,担任直学士院、中书舍人之职。^②由乡绅到词臣的身份转变使他颇有感触,他在《忆昔》诗称“人生惟有村田乐”,“老难待漏守东华”,^③坦言往昔的乡居生活远胜时下的词臣之任。而其词垣值宿的吟咏之作即鲜明地呈现出村居野俗的趣味在馆阁氛围中的蔓延,从中能够清晰看到制度矩范退场与个人情怀扩张的态势。

刘克庄的词垣值宿诗作依次为《九月初十日锁(当为“锁”之讹)宿玉堂七绝》《壬戌首春十九日锁宿玉堂四绝》《二月二十日再锁宿四绝》,^④皆是篇幅短小的绝句,与前引杨、欧诗作格调迥异,展示出鲜明的反宫廷审美的旨趣:三诗略无一句摹写宫殿形制;写值庐内景,只有“转枕依然梦不成,小窗颇觉晓寒生。昏花却怕宫莲照,垂下纱幮听六更”及“四壁蠹书常锁闭”之句;写值宿饮饌,只有“内厨进膳惟蔬素”之句。诗中未予罗列华美的宫廷意象,所述唯是年老者失眠、惧寒、畏光的感受,以及所处书室的陈旧、餐食口味的寡淡。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对草制文思的态度,刘诗未予正面表述制诰之文的庄重典雅,却颇有诗句道及衰年当制而乏于辞藻、艰于作文的无奈,如“彩笔梦中先索去,不知持底作词臣”“幼吹葱叶还堪听,老画葫芦却未工”“衰飒秃翁垂八十,四更烛下作蝇头”等。不仅如此,刘诗还进而抱怨文字智识所带来的人生烦恼:“秀师罪我当犁舌,贺母嗔儿欲吐心。老去未偿文字债,始知前世业缘深”;“搔胃搜肠极苦辛,先贤曾叹费精神。瓣香重发来生愿,世世无为识字人”。前者以法秀禅师呵斥黄庭坚好写艳词、李贺之母嗔怪李贺呕心作诗的事典来比拟自己生平费心于撰述的业缘,^⑤后者则更云来生愿为无知无识之人以摆脱搜索枯肠经营文字的苦恼。如果说前述欧诗抒写山林江湖之思、外任地方之愿,尚停留于士大夫阶层矜示风雅、留恋仕途的心境,那么此处刘诗意欲抛却智识之累的表达则更接近于乡野村俗的旨趣。而这一倾向于刘诗的行文用语已颇有展示,如其“角门闭了晓方开”“而今老去都忘了”“封题进了鼓三挝”等句运用“了”这一俗白化的表达方式;另外,他还颇以野俗之词入句,如“尽笑翰林麻草拙,谁知老子布衾寒”中径直自呼“老子”,与前句的“翰林”形成鲜明的反差;“热瞞舍下痴儿女,道是先生视草来”中的“热瞞”为宋人俗语,意为欺瞞、欺骗之意,刘氏曾在描摹村俗情致的诗词中使用。^⑥这些

① 参见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150页。

② 刘克庄于淳祐十一年(1251)任直学士院,时年六十五岁;于景定元年至三年(1260-1262)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时年七十四至七十六岁。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256、321-337页。

③ 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97页。

④ 参见《刘克庄年谱》,第260、340页。以上引诗,参见《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第1013-1014页;卷三二,第1729-1732页。

⑤ 黄庭坚、李贺之事,参见普济:《五灯会元》卷一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38页;李商隐:《李贺小传》,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七八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49页。

⑥ 如其《樗庵采药二绝》其二(《刘克庄集笺校》卷二五,第1393页)云:“坠壳纷纷满树间,更抛墙外费防闲。暗中仍被揶揄笑,此老冬烘可热瞞。”《水龙吟》(钱仲联:《后村词笺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云:“吟歇后诗,说无生话,热瞞村獠。”

都似在表明，刘氏是有意与馆阁式的典雅风尚立异，诗中的制度语境消解殆尽，其基调转而变为彰显个体情怀的村野之趣。

三、制度象征与修辞功用：宋代词垣的吏员角色

在宋代词垣事务的日常运转中，词臣的周边充斥着吏员的身影。词垣之吏辅助词臣办公，听候词臣差遣，职事颇为繁杂，包括充当词臣入朝的仪仗导引，^①担任词垣草制的保密工作，^②誊录、校核草就的制诰文本（详见后文引文），整理、编录本朝的制诰文集，^③以及为词臣催索草制的润笔礼物，^④甚至还要负责置办词臣离任的饯别酒宴。^⑤

中国古代的吏员往往在同一官僚机构之中长期、终生甚至世代为吏，服务的时间远远长于官员的任期，因而吏员阶层常常更为熟谙朝廷制度的传承与运行。历来史书追溯朝代长时段的典制以及相关的人事掌故，时而会述及吏员的议论与行止。如《后汉书》载新莽末年光武帝担任刘玄的司隶校尉，“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待其部曲收复三辅之地，其地吏士迎候汉军，“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⑥《新唐书》载宣宗朝裴坦初任知制诰时按例谒见丞相裴休，“故事，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然而裴休却极为慢待裴坦，“顾左右索肩舆亟出”，以至“省吏眙骇，以为唐兴无有此辱”。^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宋高宗丧前，太常少卿朱时敏久不升迁，屡求外任，太常寺老吏以“德寿宫服药”劝其留任，原因在于历来太常少卿“皆以大丧礼毕，除仪曹贰卿（即升任礼部侍郎），老吏习知之”。^⑧上述吏员或是作为汉代司察制度的见证者，或是作为唐代政事堂上下级见面礼仪的观察者，或是作为宋代太常寺官员升迁惯例的知情者，皆谙习朝廷长时段的制度典例，甚而洞悉制度运行之中种种的世态人心。吏员的言行与制度的细节曲折互为表里，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抽象制度人格化的象征。

宋代的词垣之吏自是词垣制度的谙习者。如《湘山野录》记叙北宋舍人院追武唐代旧典种植紫薇花的掌故时云：“（真宗）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谔初知制诰，至西掖，追故事独无紫薇，自别野移植。闻今庭中者，院老吏相传犹是昌武手植。”^⑨可见院中故事旧制在吏员中间的传承。在词垣的文学空间中，吏员的角色亦能展现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吏员作为词垣规制实际运行的知情者，其识见言谈时而颇能折射制度对于词臣个人才情的制约之力；另一方面，吏员的角色在扬显词臣个体情感、才华的诗文著述中，又往往作为一种标志词垣氛围的修辞性的符号元素，被驱使运用，以托举词臣个人化的形象。我们先来看前一方面。

① 洪迈《容斋随笔·初笔》卷九“翰苑故事”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3页）载：“学士入朝，犹有朱衣院吏双引至朝堂而止。”

② 洪遵《翰苑遗事》（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册，第111页）载翰苑词臣草诰后，为保证制诰内容不提前外泄，由“御药（指内廷宦官）启扇（指学士院之扇），持入禁中，院吏复扇。至朝退，然后开院，率以为常”。

③ 欧阳修《论编学士院制诰札子》（《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85-1686页）云：“（本朝制诰）从前虽有编录，亦无类例卷第，只是本院书吏私自抄写，……臣今欲乞将国朝以来学士所撰文书，各以门类，依其年次，编成卷帙，……如本行人吏不画时编录，致有漏落，许令本院举察，理为过犯。”

④ 《归田录》卷一（《欧阳修全集》，第10页）载：“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引《司马光日记》载熙宁四年（1071）舍人院之事（第5527页）云：“才元（即李大临）、子容（即苏颂）得外官，胜之（即王益柔）以故事饯之，和叔（即陈绎）、曾布皆不赴。明日，中书送舍人院吏于京府杖之，曰：‘何为擅用官钱饯外官？’”可见置办饯别酒宴的具体事务历来由舍人院吏负责。该事中院吏由此而受罚，属于因新旧党争而发生的例外事件。

⑥ 《后汉书》卷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10页。

⑦ 《新唐书》卷一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75-5376页。

⑧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奉常毕大事例迁仪曹”条，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81页。

⑨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刘攽文集载北宋仁宗朝知制诰刘敞之事云:

尝一日有诏,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进。公(即刘敞)将上马,遂不解带,援笔书之,凡数千言,词意皆不同,吏誊白不暇,往反才食顷。执政皆惊视,以为所未尝见。吏有窃言曰:“公乃以此见忌耳。”故事,舍人迁翰林者,皆以久次。执政不欲公在内,每有阙,辄置不用。^①

《容斋随笔》载徽宗朝翰林学士刘嗣明之事云:

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刘嗣明尝作《皇子荆胎发》文,用“克长克君”之语,吏持以请。嗣明曰:“此言堪为长堪为君,真善颂也。”吏拱手曰:“内中读文书不如是,最以语忌为嫌,既剋长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②

刘敞、刘嗣明曾于词垣草拟制诰,前者面对连草九制之任,以倚马之才一挥而就,后者用《诗·大雅·皇矣》“克长克君”的“善颂”之语入文,显示出词臣个人化、文人式的骋才之举与文胜之迹。然而,词垣之吏以其老于世故的眼光审视二事,却能于制度实际运行的幽微之端指示其中的失当之处:前者因为过于矜才示能而会遭受宰执阶层的嫉妒,后者则因“克”“剋”二字的音同形近而会触犯皇家的忌讳。显然,词垣之吏较之词臣更为知悉,在制度语境之中,除了公行典章的明文规定,还存在着深曲潜隐的行事规则,^③这些都成为限制个体才情发挥的因素。

再来看扬显词臣个体情感、才华的诗文著述对于吏员角色修辞化的运用。北宋真宗朝诗僧简长曾在河北沧州写有一首五律寄赠时任知制诰的丁谓,显示出丁谓个人的方外之谊:

想极南溟外,江园草树秋。浮生如寄梦,几夕是离愁。仙馆间明月,星车背远流。只应西掖吏,时复望沧洲。^④

这首《寄丁学士》是宋代较早一首扬显词臣个体情怀而又出现词垣之吏角色的诗作。尾联中遥望沧州的“西掖吏”并未被赋予独立自觉的人格,他只是在修辞上作为借指丁谓的代语,功能接近于古文中常用的“执事”,与颌联中的“仙馆”“星车”相类,皆是用以标志词垣氛围的符号元素,共同托举着丁谓位居清贵而又瞻慕方外的形象。此后的时代里亦颇可见到这类以词垣之吏角色托举词臣形象的诗文。不过具体构思较之上诗已有变化——它们更多是利用吏员在词垣长期供职这一惯例,特别拈出“老吏述旧”的情节,以其作为一种导引式的修辞符号,来铺设一层追忆往事的情境,为扬显词臣个人文人式的情怀服务。

这类著述中,有追溯词臣个人家风优美之作,如北宋元丰末苏轼有诗《再次韵答完夫穆父》(题后自注: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酬答其时同任中书舍人的胡宗愈、钱勰云:“掖垣老吏识郎君,并辔天街两绝尘。汗血固应生有种,夜光那复困无因。”^⑤元祐后期范祖禹初任翰林学士时有诗《初到玉堂》自叙云:“空愧朱衣华发吏,玉堂三世见题名。”^⑥二诗或是恭维他人,或是称述本家先辈昔日的词垣荣光,皆使用了“老吏述旧”的符号元素,以此衬托词臣个人家世的清华。也有表现词臣彼此私谊笃厚之作,如刘克庄在《九月初十日锁宿玉堂七绝》其七中云:“院中老吏无有存,谁记南塘与雁湖?”^⑦“南塘”“雁湖”分别为刘氏前辈赵汝谈、李壁之号。刘氏早年即与赵、李相识,深得二人称赏,与之私谊甚笃。^⑧李壁、赵汝谈分别于宁宗朝嘉泰、理宗朝端平至嘉熙年间在

① 刘敞:《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敞)行状》,《彭城集》卷三五,逯钦立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933-934页。

② 洪迈:《容斋随笔·初笔》卷一五“京师老吏”条,第202页。

③ 学界在某些场合将这种行事规则称为“非正式制度”,参见周雪光:《论非正式制度——中国官僚体制研究的启示》,《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第223-251页。

④ 《全宋诗》,第3册,第1458页。许红霞《宋初九僧丛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献研究所编著:《古典文献研究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3页)一文较早考证出该诗所赠者为丁谓。

⑤ 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二七,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31页。

⑥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6页。

⑦ 参见《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第1014页。

⑧ 参见《刘克庄年谱》,第26、52、74页。

翰苑当制，^① 淳祐间刘氏作此诗时二人已然过世。刘诗反用“老吏述旧”的修辞来表彰两位前辈的翰苑风度，寄托对他们的缅怀之意。还有比较异代词臣才情高下之作，如《齐东野语》中有一篇文字言及南宋乾道、淳熙间洪迈在翰苑任上的一则轶事：

洪景卢（即洪迈）居翰苑日，尝入直，值制诏沓至，自早至脯（当为“晡”之讹），凡视二十余草。事竟，小步庭间，见老叟负暄花阴。谁何之？云：“京师人也，累世为院吏，今八十余，幼时及识元祐间诸学士，今子孙复为吏，故养老于此。”……（洪迈）曰：“今日草二十余制，皆已毕事矣。”老者复颂云：“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矜之云：“苏学士（即苏轼）想亦不过如此速耳。”老者复首肯咨嗟曰：“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不曾检阅书册耳。”洪为赧然，自恨失言。^②

这段出自南宋的笔记小说的叙事，多有虚构的成分。其中的“老吏述旧”固然远较前引数诗具体生动，然而就根本义旨而言，其情节的设置之于整体文本的铺展，仍然主要是在发挥修辞性的功用——借“老吏述旧”之言导引出一层追忆词垣往事的情境，以此建构起苏轼、洪迈两位异代词臣的关联，曲折地展现了他们两辈翰苑人物个人才华的高下之别。

四、仕进态度与退闲心境：宋代词垣的“白居易崇拜”

有唐一代的杰出词臣如张说、苏頔、常袞、杨炎、陆贽、白居易之辈，是宋代词臣普遍尊仰、追慕的前朝人物。其中白居易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多元，其仕宦进取的抱负与退居闲适的风度对宋代词臣群体影响深远。我们从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两种语境出发，来观照宋代词垣“白居易崇拜”风尚之下的诸多人事，能够发见其中相与异趣的义涵。

白居易一生仕途几经沉浮，因应于人生境遇的顺逆之别，白氏的心态显现出仕进、退闲二者兼容的特征。《韵语阳秋》载有一段对白氏的评语：

白乐天号为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沉之际，悲喜辄系之。自中书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诗曰：“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又曰：“委顺随行止。”又曰：“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自江州司马为忠州刺史，未为超也。而其诗曰：“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又云：“五十专城未是迟。”又云：“三车犹夕会，五马已晨装。”及被召中书，则曰：“紫微今日烟霄地，赤岭前年泥土身。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观此数诗，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③

这段评语对白居易颇致微词，指摘其生平所言只是表面知理，吟咏之间则未忘仕宦。然而，如果以一种更为公允的立场看待白氏的上述诗句，则未尝不可将其所表达的心境视为一种随分自处、安于升沉的态度：仕途得意之时成为朝廷事务热心的参与者，以如鱼得水、如鹤乘轩之句自我激扬；仕途失意之际成为闲退生活安然的适应者，用委顺随缘、退身江海之语自我排遣。这种心态之于仕进与退闲二端，并不采取就此舍彼的决绝态度，而是以两者兼容的通融之意恬然处之，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为境遇各异的宋代词臣提供了追武的范式。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在制度矩范的语境里，白居易是宋代皇帝对词臣济辈表达奖勉之意时所乐于称述的前朝人物，受勉词臣循此基调，规范性地称述白氏的代言之功；而在个体情怀的语境里，白氏又成为某些仕途失意的词臣仰慕的对象，他们称述白氏的退居心境、闲适诗作，以之作为自我慰藉的精神寄托。

首先来看宋代词垣的崇白风尚在制度矩范语境之中的表现。有宋一代，皇帝亲自抄录唐诗赐赠奖勉词臣的事例颇为罕见，然而根据史料记载，白居易之诗至少有两次作为皇帝抄录的对象专门赏赐词臣：

① 李壁于嘉泰四年（1204）任直学士院，赵汝谈于端平三年至嘉熙元年（1236—1237）任权直学士院、直学士院，参见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册，第727、720页。

②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〇“洪景卢自矜”条，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页。

③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一，第134—135页。

元祐二年苏轼在翰林学士任上侍讲《论语》终篇,哲宗亲书白氏《紫薇花》诗以赐;^① 淳熙五年(1178)周必大在翰林学士任上奉敕撰成《选德殿记》,孝宗亲书白氏《七德舞》诗以赐。^② 前诗为白氏长庆年间任中书舍人时所作的绝句:“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吟咏其在词垣的闲雅生活。后诗为其元和年间任左拾遗时所作《新乐府》五十篇的首篇,歌颂唐太宗的武功文德,以期将初创王业的“艰难”垂示李唐子孙。^③ 哲、孝两朝以白氏此二诗赐赠词臣,一则表现出对白居易词垣风度、颂圣撰述的欣赏态度,一则也寄寓着对本朝词臣追武白氏代言之功的期许之意。此二事例颇可视作宋代皇权意志对于词垣崇白之风施加的一种塑造之力,其实质是从龟勉仕位的工具意义为受赐词臣阐述白氏的风范才情奠定基调。由此,苏轼、周必大依例而撰的敬谢诗作皆规范性地称述白氏积极仕进的一面。苏诗中有“玉堂昼掩文书静,铃索不摇钟漏永。莫言弄笔数行书,须信时平由主圣”之句,前两句模仿白氏《紫薇花》之辞描写词垣生活的闲雅,后两句将此闲雅之态置于君主的圣明治政之下;后续更有“犬羊散尽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宫。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文思天子师文母,终闭玉关辞马武。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之句,^④ 称颂朝廷的治边之能,表述自身期望追随白氏紫薇故事勉力草制、襄助宏业的意愿。周诗的口径与苏诗如出一辙:“我皇英锐真太宗,文武神圣功德隆。黄钺指期擒颉利,捷书先献太安宫。元和学士白居易,臣非其才私有志。愿随班贺四海清,续唐之歌夸万世。”^⑤ 亦是以官方口吻表达对白氏的钦羨。

其次来看宋代词垣的崇白风尚在个体情怀语境之中的表现,此点可例举王禹偁出入词垣之事来阐述。王禹偁一生追慕白居易的风度,曾作《芍药诗》,并在诗序中自述任职词垣的经历,以之追比白氏的宦迹,称“白傅之任常蹂躏矣”。然而在词垣应制之务的层面,王禹偁却对白氏的草制水平并不表以最高的欣赏态度,其《贺柴舍人新入西掖》有诗句云:“好继忠州文最盛,应嫌长庆格犹卑。”句后自注称:“(柴成务)尝与予评前贤臣诏诰,以为陆相(即陆贽)首出,若《奉天罪己诏》,元、白之徒可坐在庑下。”^⑥ 明确指出白氏的制文水平逊于陆贽。

王禹偁对白居易的追慕之意,主要体现在其于词垣仕途的失意之际,以白氏的退闲意趣自我抚慰的情怀。淳化二年(991)王氏在知制造任上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⑦ 次年作《得昭文李学士书报以二绝》诗自述以白诗排遣谪中的忧闷心绪,其一云:“谪居不敢咏江蓠,日永门闲何所为?多谢昭文李学士,劝教枕藉乐天诗。”其二云:“左宦寥寂惟上洛,穷愁依约似长沙。乐天诗什虽堪读,奈有春深迁客家。”诗中的李学士为李宗谿,时任直昭文馆,^⑧ 以后成为真宗朝的著名词臣。^⑨ 王、李二人对白诗的共同好尚,颇能折射宋代馆阁词垣的仕宦群体私下对于白诗可资慰抚宦场失意的普遍的认同态度。王禹偁于贬谪中另有一首《谪居感事》诗,更具体地言及对两首白诗的追慕——诗中有“琴酒图三乐,诗章效四虽”句,称及白氏的《琴酒》与《吟四虽》,^⑩ 而此二诗作为白氏大和年间在洛

① 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91页。

② 参见王聪聪:《周必大年谱长编》,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第306页。

③ 以上两诗,参见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一九、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16、275-276页。

④ 苏轼:《九月十五日迓英讲论语终篇赐执政讲读史官燕于东宫又遣中使就赐御书诗各一首臣轼得紫薇花绝句其词云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翼日各以表谢又进诗一篇臣轼诗云》,《苏轼诗集》卷二九,第1543页。

⑤ 周必大:《进谢御书古诗》,王瑞来:《周必大集校证》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0页。

⑥ 以上两诗参见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一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王黄州小畜集》卷八,《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册,第607、578页。陆贽晚年被贬忠州,最后卒于其地。

⑦ 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3页。

⑧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500页)载:“(淳化二年十月)以直史馆李宗谿直昭文馆,避其父监修国史故也。”

⑨ 李宗谿于咸平三年至景德二年(1000—1005)任知制造,于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05—1013)任翰林学士,参见《宋代京朝官通考》,第2册,第17-20页;第1册,第640-642页。

⑩ 以上所引《得昭文李学士书报以二绝》《谪居感事》诗,参见《王黄州小畜集》卷八,《宋集珍本丛刊》,第1册,第578、574页。两诗系年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第128页。

阳担任闲官时所写，表现了“心地忘机酒半酣”“忘荣知足委天和”的淡泊意趣。^①

淳化四年王禹偁还朝，至道元年（995）仕至翰林学士，其翰苑同僚张洎升任参知政事，王氏致以贺启，^②《青箱杂记》载其事云：

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时与之在翰林而大拜者（即张洎），王以启贺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翁之叹。”以白乐天尝有诗云“元和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故也。^③

引文所录王氏贺启联句中的后句，典出白居易会昌元年（841）诗《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④白氏时年七十，已停少傅之职，即将致仕，^⑤忆及自己元和任翰林学士之时有同僚六人，其他五人后皆升任宰相，唯己一人未能致身相位。其诗以“渔翁”自拟，在自叹宦位不显的同时，也以闲钓的形象来表现甘于退闲的心境。王禹偁将其诗意化入启文，表述同僚大拜而自己不得升迁的境遇，一方面借之嗟叹仕途的困顿，^⑥另一面也是以白氏的退闲之旨慰藉一己的失落之心。王氏出入词垣的偃蹇仕运与其标举白氏的退闲旨趣互为映衬，展现了宋代词垣崇白风尚中的个人情怀，这种倾向明显区别于龟勉仕位的官方式的表述口径。

五、结 语

本文以词臣僚辈日常生活之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建构了宋代词垣这一文学空间。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皇帝侍从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于词臣才情的制约之力；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龟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词垣的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够以村野之趣与典雅风尚立异，突破宫廷式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

长久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意向认为应制性的文学环境缺乏抒写情志性灵的土壤，而低估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价值。此中较为有名的研究案例或可提及宇文所安《初唐诗》对初唐“宫廷诗”概念的建构。宇文所安认为，五世纪后期以至七世纪，宫廷是“中国诗歌活动的中心”，但宫廷诗的总体风格因其应制的特点而“矫揉造作”“刻板严格”。宫廷以外的诗人们“越出宫廷诗所严格控制的题材和场合”，才使当时“诗歌的主题范围开始扩大”，文学“迈向了新的自由”。就此而言，“宫廷诗”俨然成为定义“文学自由”的反面“标准”与“惯例”。^⑦初唐时期因其写本时代的特点，传世文献的数量极为有限，或会造成研究者对应制环境的描述较为单一，易于笼统地将之置于文学个性化发展的对立面。而有宋一代，雕版印刷逐渐发展兴盛，传世文献数量庞大，颇可资以更为具体真切地探究当时应制环境的内涵。通过对宋代词垣文学空间的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应制环境固然因为制度矩范的笼罩，其中的撰述吟咏之事有流于刻板程式的一面，但置身其中的文士作为士大夫文化的精神个体，时而能够实现对制度语境的超越，而应制文学环境的内部其实一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应制臣僚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风度气概，也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责任编辑：庞 礴）

① 参见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六、二九，第2100、2281页。

② 其事系年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第142页。

③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

④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六，第2752页。

⑤ 参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7、317页。

⑥ 阮阅编《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四收录《青箱杂记》此条笔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将其列入“怨嗟门”中，可见宋人颇能体认王氏其句所寄寓的怨嗟之意。

⑦ 参见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2页。